

解放战争：我心战瓦解敌军177万

■熊伟

1949年9月19日，国民党部队在同一天内连续发动3次较大规模起义：董其武率所部6万余人在绥远起义，马鸿宾、马博清父子率81军1.6万余人在宁夏中宁起义，国民党海军“长治”号在长江口起义。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，再次彰显我党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历史性贡献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，国民党军起义、投诚、接受和平改编的官兵总数达177.3万人，相当于敌军800多万总兵力的1/5，这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，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。

以正义、真理瓦解敌军。瓦解敌军是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独特作战方式，依靠的是正义和真理的力量，争取的是人心向背，分化的是敌人阵营，体现的是党领导下人民军队政治上的先进性和感召力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反对独裁内战，争取和平民主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，中国共产党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方针已深入人心。蒋介石一味迷信所谓的“正统地位”和政治优势，不顾民主党派和人民反对，蓄意发动内战，在政治上失去人心。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，国民党军队一再损兵折将，先后经历了从“全面进攻”到“重点进攻”、从战略攻势到战略防御的格局逆转，“士兵受冻挨饿，不死于抗日而死于内战”，进而引发政治上的动摇、心理上的挫败、精神上的崩溃。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，“官兵在心理上受到刺激与侮辱，以致精神上转为沉闷、消沉、无法振作起来”。

解放战争中，我党在坚持群众路线、统一战线的同时，不失时机地把瓦解敌军工作上升到战略高度。1945年10月，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、中央局和分局成立“国军工作部”，在国统区增设联络股和联络干事，专门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和心战瓦解工作。1945年12月，中央军委在关于粉碎国民党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指示中明确指出：“应抓紧国民党一切罪恶行为与铁的事实，坚持自己和平民主立场，向国民党军有系统的、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与争取杂牌、中间势力联系起来，号召他们反内战的



国民党海军“长治”舰官兵起义后抵达上海

起义，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区来，参加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事业。”1948年1月，为配合军事打击进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工作，“国军工作部”改称“敌军工作部”，在各部队政治机关设“敌工部”，委派可靠干部负责。在我党我军正确政治主张的宣传和感召下，国民党军队上到高级将领、下到普通官兵纷纷认清出路，站到人民一方来。特别是何基洋、张克侠、廖运周等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，在战争紧急关头调转枪口，完全打乱敌军部署，敲响了“蒋家王朝”大势已去的丧钟。

以情谊、关怀争取敌军。解放战争中，我军瓦解敌军工作融政治、心理、精神、情感攻势于一体，打出一套感情关怀、政策引导、诚信吸引等组合拳，一举抓住蒋介石军事集团不均衡、不团结、不公正的固有弱点。如蒋介石长期奉行“嫡外有别”的清除异己政策，对嫡系部队偏袒照顾，对非嫡系部

队区别对待，妄图达到既消灭解放军，又消灭杂牌军的目的，结果引发非嫡系部队极度不满。当杂牌部队在蒋军序列中备受歧视、沦为炮灰时，我党我军却对他们待之以诚，以民族大义、真诚态度反复争取，很多非嫡系部队都不愿再为“蒋家王朝”卖命，走上起义的光明道路。同时，我党还抓住国民党军队内部官兵有别的特点，分化瓦解、对症下药，对高级军官采取政治上给予出路、不咎既往的政策，还及时动用国统区地下党力量，将他们的家人转移到安全地区。对国民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，则坚持“来去自由、走留自由”的宽大政策。

由于执行正确的瓦解敌军策略，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迅速发生变化。解放战争第一年，国民党总兵力为430万人，我军只有127万人，不及敌人的1/3；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末，敌军总兵力为365万人，我军上升为280万

人，敌我力量比为1.3:1；而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末，我军总兵力上升为400万人，敌军则下降为149万人，敌我力量比为1:2.68。

以灵活手段感召敌军。我党我军的瓦解敌军工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针对敌方不同阶层、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心理状态，采用不同的方法手段，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。1947年10月后，我党先后开办《对国民党军广播》《对蒋军官兵讲话》《放下武器的蒋军军官介绍》《放下武器的蒋军军官给家属的信》等针对国民党官兵进行心战宣传的广播节目。国民党官兵从高级将领到下级军官，都十分注意收听我军广播电台，尤其爱听被俘国民党军官有关生活等情况的谈话。我方还充分利用国共高级将领之间的师生同窗关系，广泛开展对敌争取工作，要求各级人员“写信给敌方各级军官，并将这些信公开地散播，当作一个群众运动，公开地进行这一工作”。

据记载，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先后创造出善出无线电广播、火线喊话、传单投递、书信投寄、俘虏遣返、民主人士劝降、敌军亲属唤子索夫等多种手段，如同一颗颗重磅心理战炮弹，打在国民党军各个阶层的心坎上，形成一条无形的战线。连一些蒋氏嫡系将领，也在我军军事与心理的双重攻势中败下阵来。周恩来在辽沈战役中，亲自给国民党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写信，希望其“顾念旧谊，特电促使下决心起义”，使郑洞国深受触动，率长春守军放下武器。历史雄辩地证明，解放战争的胜利，既是我党我军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，同时又是我党我军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的胜利。

（作者系黑龙江省绥化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）



三十六计与古今战争 第三十五计：『连环计』

张肇房灵超

原典

“连环计”是一个给敌人甩包袱或制造麻烦，使其自相钳制，失去行动自由，进而寻机破敌的计策。在《三十六计》中，该计原文为：“将多兵众，不可以敌，使其自累，以杀其势。在师中吉，承天宠也。”意指敌人力量强大，不能与之硬拼，应该运用谋略使他们相互钳制，以此削弱对手，剥夺其优势。将帅巧用谋略，克敌制胜如有神助。

古代战例

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，孙刘联军的谋士庞统诈降曹营，怂恿曹操将全部战船用铁索连起来，表面上是为帮助曹军克服不善水战的弱点，实际上是让其战船无法分散逃脱，成为孙刘联军火攻的靶子。从庞统献计巧锁战船，到周瑜派黄盖诈降，继而一把火烧出“天下三分”的鼎立之局，环环相扣，是“连环计”的经典运用。

宋朝名将毕再遇率部与金军遭遇，毕再遇先采取流动游击战法，忽进忽退，调动和消耗敌人。等到夜幕降临，毕再遇料定金军已人困马乏，就把事先拌香料煮好的黑豆撒在阵地上，再次前出挑战，没几回合便诈败后退，金军乘胜追击，跑到宋军布置好的阵地上，早已饿极的金军战马闻到豆香，只顾埋头争食，无论金军如何抽打都不肯前进，毕再遇抓住战机回师反击，大获全胜，而这也是“撒豆止驢”典故的由来。

现代战例

1973年，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，失败的阿拉伯诸国利用“石油武器”造成油价暴涨，以威胁美国，遏制以色列。为打破被动，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决定亲自出马，打着调解中东争端的旗号，接连访问中东多国，试图分化阿拉伯国家。经过整整一年的奔波，基辛格于1975年9月2日促成以色列和埃及签订“西奈协议”。这个临时性和平协议究竟有多大效力暂且不说，但只此一招就分裂了原本一致对外的阿拉伯世界，阿拉伯诸国

此后使用“石油武器”时不再像从前一样步调一致。埃及因这个协定于己有利，又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，欣然签字。叙利亚、利比亚、伊拉克和巴解组织则全力反对。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埃及自此失去了领导地位。另外，由于苏联自始至终不同意这个协定，苏埃友好关系也宣告结束。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协议签署后，发表声明猛烈抨击苏联。基辛格的“连环计”，一举多得，改善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态势。

计谋分析

事物都是有联系的，联系中隐含变化和机遇。“连环计”就是根据或促进变化，把握和创造机遇。通常情况下，“连环计”意在诱敌“自累”，以“累”促变，而后图之。筹划时，应当一计累敌，另一计攻敌，两计并用，前计为后计运用基础，后计为前计扩张战果，紧密衔接，相互配合，方能取胜。如庞统的“连环计”，先欺骗曹操自锁战船，再诱黄盖诈降放火，就构成一套完整的谋略。

行动自由，是军队的命脉，“连环计”应重视钳制敌行动自由，扩大我方行动自由。恩格斯说：“你可能被退却，你可能被击败，但只要你能左右敌人的行动，而不是听任敌人摆布，你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。”主动与被动是反映军事活动中是否拥有行动自由权的一对重要概念。力争主动，力避被动，是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，也是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要求。“连环计”的用法很多，但根本目的都是从决定战争胜负的诸要素中，抓住敌关键性弱点，施谋用计，钳制敌行动自由，进而掌握主动。毕再遇抗金，没有与强敌死打硬拼，而是千方百计调动和疲敌对手，巧妙诱敌入彀，限制金军骑兵机动性，自然创造出破敌战机。

通过利于敌，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背上包袱，也是“连环计”的题中之义。解放战争初期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。蒋介石发动“全面进攻”，我军为歼敌有生力量，赢得最终胜利，在战略指导上运用“连环

计”，主动放弃150座城市，让敌人又开五指，拉长战线。国民党军要占领控制这些地盘，不得不将大量兵力撒在星罗棋布的“点”“线”之上，机动作战兵力由117个旅降至85个旅，而且力量分散，易被我各个击破。这150座城市的暂时放弃，发挥“撒豆止驢”的效果。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，蒋介石就不得不把“全面进攻”改为“重点进攻”。战役实施中运用“连环计”，在于照应全局，照应各战场联系，照应战役发展各阶段。平津战役中，毛泽东同志提出：两星期内对平津之敌隔而不围；对张家口、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；对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不作最后歼灭等，都是为给棋不定的傅作义留下一个个“包袱”，令其欲逃难舍、欲战不能，最终不得不接受和平改编。

战争中，一计克敌的经典战例并不多见，更多都是多计并用，夺取胜利，“连环计”更是充分体现这一点。《兵法百篇》说：“善计者，因敌而生，因已而生，因古而生，因书而生，因天时、地利、事物而生，因法而生，因事而生。”好的计谋，既知彼又知己，重视古代经验和兵法参考，遵循天时地利的客观条件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不违背阴阳和谐之道，经得起正反两面及实践的检验。广义上说，《三十六计》中所有计谋，计与计、计与套、套与套都是首尾相顾的“连环计”，因敌用谋、因情施变、奇正配合、环环相扣，才能牢牢钳制敌人而不致于人”的主动，最终克敌制胜。



纸面数据庞大，实战战力薄弱

在持续两年多的鸦片战争中，几乎每场战役都是英军舰队与清军沿海炮台作战，清军水师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。这并非清军水师力量薄弱，相反，清军水师纸面数据颇为庞大。清廷入主中原后，全国水师长期保持在6万人左右，其中八旗水师约1万人，绿营水师约5万人，在战时还会临时招募水勇作战。鸦片战争时，清军水师约有930艘战船。而沿海多省地方水师因招募水勇，兵力更是一度达到10万人，大小战船700多艘。

但由于清军水师战船技术落后，武器特别是火炮远远落后于英军，训练水平也极其低下，所以无法与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英军舰队抗衡。

以敌文化象征命名己方军舰

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，其舰艇命名并不是根据一套规则，而是由海军将领决定，无意中就闹出一些玩笑。

如19世纪末，德国开工建造的齐格弗里德级岸防铁甲舰的2号舰“贝奥武夫”号，是由海军部的汉斯·科斯特少将命名的。欧洲文学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《贝奥武夫》，讲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英雄贝奥武夫的故事，是迄今发现的一部英国盎格鲁-撒克逊时期最古老、最长、较完整的文学作品，至今仍是英国的国家文化象征。

在“贝奥武夫”号下水时，英国国王同德国皇帝还是舅甥关系，这一命名倒也无可厚非。而在20年后，英德之间爆发战争，德国海军中有一艘“贝奥武夫”号这样以敌国文化象征命名的军舰就略有些尴尬了。（乌沃）



郑起保存的毛泽东主席签名笔记本和他佩戴军功章的照片
在朝鲜战场上，我军冲锋号给敌军心理造成极大冲击

军号声声铸传奇

■丁成 张苗

9月11日，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发布消息，自2018年10月1日起，全军恢复播放作息号；2019年8月1日起，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。这标志着自1985年取消司号员编制后，军号和司号员将再次出现在我军部队中。

在中国，司号兵这一兵种最早出现在清末，北洋新军引进洋式军号，部队内设有司号兵编制。人民军队在八一南昌起义后的初创时期就有司号兵，我军司号兵编制在通信兵序列中，连编有司号员，营编有号目，团和师编有号长。另外，我军还设有司号大队，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通信学校都曾设有司号大队，专门为部队培训司号员。

在我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，军号除发挥联络通信等基本功能外，在作战中也屡建奇功，写就一段段传奇。

1936年春，红四方面军总部驻扎在四川西北的梦公镇。一日，朱德总司令率部官兵举行篮球比赛，北面突然出现大股敌人。此

时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均在外线作战，机关总部只有一个警卫连保卫，形势异常严峻。朱老总镇定自若，要求司号员分散到周围山坡上，听令一齐猛吹冲锋号。朱老总瞅准时机下令反击，他高声喊道：“红军战士们，消灭敌人的时刻到了，冲锋啊！”顿时，四面八方响起震耳欲聋的冲锋号声和喊杀声，好似千军万马一齐冲杀。这阵势吓得敌人连连带，直往山下逃窜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胶东军区独创“军号游击战法”，令日军闻风丧胆。1939年冬，胶东军区5旅15团在山东的松山镇与日伪军狭路相逢。为掩饰进攻兵力的不足，司号员被分散部署于松山镇的周围，战斗打响后，松山镇四面八方同时响起冲锋号，敌人以为八路军主力包围松山镇，顿时惊慌失措，我军趁势发起猛烈追击。此役，日军小队伤亡过半，伪军中队几乎被全歼。

在朝鲜战争中，我军吹响的冲锋号以及随之而来的排山倒海的冲锋号，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胆

颤心惊，而由于敌人对我军冲锋号的惧怕，在之后的战斗中还出现了一段传奇。

1951年1月2日，我志愿军39军116师347团7连奉命控制公路旁的一处无名高地，当面之敌是大名鼎鼎的英军第29旅皇家“来复枪团”。该团团长奥斯特曾扬言，“来复枪团”的战斗可以顶得上中国的一个师或一个军。这次战斗极其惨烈，7连官兵伤亡惨重，连长、指导员、副连长全部牺牲。在阵地仅剩7人防守，弹药耗尽的情况下，英军又发起进攻，这时司号员郑起突然吹响冲锋号，竟吓得英军自乱阵脚，仓皇溃逃。如今，那把曾在阵前吓退英军的传奇军号，就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。

